

# 重訪哥倫布

陳方正

我必須再到海上去，到孤寂的海與天之間，……因為潮水奔騰那種強烈的、野性的呼喚，委實教人無從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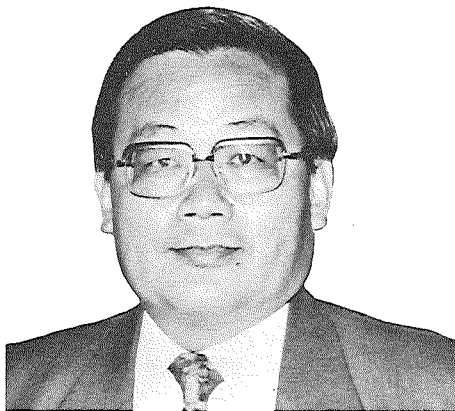
美斯菲德：〈航海熱〉

像他那個時代有野心的熱那亞少年一樣，克里斯多夫從20歲開始便患上航海熱。他不但在地中海闖蕩，而且學得葡萄牙人的精湛航海技術，在大西洋沿岸從北至南都留下了足跡。但「熱病」大事發作，則是他30歲那一年，在讀到名學者托斯坎尼利從「地圓之說」（這當時已被普遍接受）推斷西航也可以到達「印地」（Indies，即歐洲熟知的中、日、印東方諸國）這個論調之後。

自此「西航尋找印地」便成為終日縈迴腦際的大計，驅使他奔走於里斯本和哥多瓦宮庭之間，令他受盡伊北利亞眾航海專家的盤詰和冷眼（設若沒有誰也意料不到的美洲，專家自然是完全正確的）。到頭來，假如加斯底的依莎貝不是受了地亞士繞過好望角的刺激，並且由於剛剛征服格蘭那大而感到興高采烈，那麼她是否會慷慨投下「還够不上款待一位來訪王子一星期」的金錢作賭注，讓這個已夾纏了六年之久的冒險家去碰一碰運氣，還是大有疑問的。

沒有任何疑問的是，哥倫布之所以「必須再到海上去」，之感到「強烈的，……教人無從抗拒」的呼喚，則和海天孤寂或其他十九世紀浪漫情懷絕對無關。他以及整個十五世紀歐洲的航海熱只有一個簡單、明確、現實的目標：「光榮與財富」，也就是說土地、爵位和黃金白銀。

葡萄牙便是這樣發展成為歐洲遠洋航海老祖宗的。與鄭和同時代的亨利親王年復一年堅持派遣船隻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險，目的就在於繞過盤踞在摩洛哥的摩爾回教徒，以求打破壟斷，直趨黃金與黑奴這兩大商品在非洲內陸的源



頭。經過足足三十年(1415-1445)艱苦探索，他終於成功了：葡萄牙航海家不但到達塞內加爾，找到夢寐以求的大量黃金與黑奴，而且發明了遠洋航行的技術和科學，摸索出控制土人，建立長程貿易網絡的方法。這時鄭和煊赫一時的海上外交已經結束八年之久，中華帝國也再不會萌生「到海上去」的衝動了，而葡萄牙的龐大貿易帝國則剛剛起步而已。

至於秉承和發揚葡萄牙航海傳統的哥倫布，目標就更清楚不過。他談判了足足三個月之久才和依莎貝簽訂的「條約」宣稱：由於哥倫布將「到海洋上去發現和佔領某些島嶼和大陸」，所以加斯底君主應允封他為「海洋上將」和一切新領土的總督；賜他免稅佔有新領土上一切出產(特別是黃金、寶石、香料)和貿易商品的十分之一；保證他有權在新領土所有貿易中投資佔股八分之一——而且，這些尊銜和特權可以傳子及孫，永世不絕！當然，依莎貝不會吃虧：從新領土一切財富徵取十分之二是公認的君主權利，不消細表。這由君主和一介白丁(還說不上是豪猾)為了「上下交徵利」而正式訂定，載之簡冊的條約，無論從明代或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看來，恐怕都是荒唐、不可思議的。但對整五百年前今日(10月12日)在聖薩爾瓦多島登陸的哥倫布來說，卻又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就是實現夢想的保證。

在今日，科學與民主被視為中國通往現代的康莊大道已經有七十多年；個人主義、海洋文化、法制精神的重要性也逐步為國人所認識了。然而，從亨利親王和三寶太監命運的對比，從哥倫布和依莎貝條約的意義，我們也許可以窺見：這許多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因素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干，底子裏卻都可能和「求利」的動力以及因「分利」而出現的節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恐怕是長期浸淫於「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思想的國人所不易覺察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忘記：亨利、地亞士、哥倫布這些探險家和隨後的亞布卻奇、哥底斯、比沙魯等「征服勇士」(conquistadores)雖然為兩個伊北利亞王國開闢了廣大的海外天地，令西非黃金、黑奴、象牙，麻六甲香料，加勒比海蔗糖，還有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的白銀源源不絕湧進歐洲，為下一世紀的查理斯五世和腓力二世奠定了輝煌霸業；然而，說到底，這霸業卻是失敗的。其所以失敗，一則是早期探險家和征服勇士的豪邁氣質過分發展，變為殘忍、暴戾、貪婪，再則由於本來可以馴化這種野性、戾氣的西班牙教會，卻因為與回教徒長期鬥爭以及受新教興起刺激，而變得封閉、僵化、保守。在「異端審裁所」的嚴厲壓力下，以伊拉斯馬斯的人文主義和亞爾卡拉、沙拉孟加這些學府為象徵的「西班牙文藝復興」被扼殺；善於製作和經商的猶太、摩爾人被驅逐出境；而雄霸歐洲的迷夢，則徒令帝國的財富浪費在無止境而又無結果的爭戰之中。

這樣，在十六世紀之後，當科學、民主、法制、海洋文化在歐洲其他國家生長、發展的時候，一度輝煌璀璨的伊北利亞卻開始滑入長達三個世紀的沉睡之中。當戊戌政變那一年再被美國軍艦的大炮驚醒時，它已經淪落到差不多和中國同樣可憐的地位，而那些紛紛獨立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則正依照原宗主國

的模式，開始軍人獨裁與革命政權反覆交替的漫長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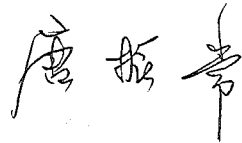
顯然，「光榮與財富」的追求可以產生許多不同文化因素，其中探索、冒險、征服、掠奪的氣質是最直接，也是西班牙人發展得最徹底的。他們因此創造了一個新時代，可是卻沒有能力接受和掌握由此而產生的下一個時代——以荷蘭的毛里斯親王、法國的笛卡爾、英國的培根、牛頓、洛克為標誌的十七世紀。這些新一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開拓的政治體系與科技文化雖然和實利的追求與分配仍然有深層關係，但其他重要的，西班牙人接受不了的基本理念，諸如真理、自由、民族權利等等，也逐漸在起決定性作用。現代文化是多元和多層累積的，哥倫布只能代表起點上一個方向的突破而已。

如今，中國文化正在急速蛻變：觀念上，對財富追求的傳統禁忌已逐漸「解咒」。也許，像許多人渴望的那樣，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因此正處於一次大爆發的前夕。然而，今天地球上也再沒有沉睡的新大陸等待新的「征服勇士」來臨。在不斷縮小的地球上，炎黃子孫究竟將如何為自己開拓另一個新空間，和以何種理念來建構下一個世紀的新文化呢？這是有待那些已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強烈呼喚，那些「必須再到海上去」的人，來用心探究的。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昔年(1943-45)陳寅恪先生執教成都燕京大學時，曾集句為聯：「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其時寅恪先生病目，人以為心情之哀由此，聯語述其實情。

其實這不只是寅恪先生一人的實情與感懷。今日不知明日事之國人多矣。尤其在戰亂動蕩時期，遷徙流離，生活多失常規，更是如此。最近我在美國，去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訪舊友田汝康教授。田公告我：普林斯頓大學，多